

漫步、出游与旅行：日常生活中的空间位移

——以民国时期上海知识群体为例（1927-1937）¹

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 胡悦吟

摘要：本文以 1927 至 1937 年间的上海知识群体为例，考察民国时期城市知识群体旅游生活的主要特点及背后体现出的文化意涵。研究发现，这一时期的城市知识群体在日常生活中有许多出游活动，主要有街头漫步、日常出游以及外出旅行三种。可以看出，一方面民国时期的知识群体在生活习性上具有与古代文人士大夫一脉相承的特点。另一方面，由于都市文化已经逐渐内化至日常生活的范围内，知识群体的旅游生活也呈现出新的面相并发展出多样化的私人体验。

关键词：旅游、日常生活、上海、知识群体

相对于日常生活所具有的重复性、习惯性与规律性，旅行是一种逸出日常生活边界之外的越界行为。旅游者暂时离开了自己原有的社会阶位，摆脱了一切社会关系，成为另一个人，亦具有“假扮”神游的意味，角色和功能均与原来的我迥然不同。经由旅途之重新体验生活，重新观察世界，而获得新的生命感受、新的体悟，也如游仙者一样，获得了生命转化的意义。²宋元明清以来，文人士大夫逐渐发展出了一套关于旅行的生活方式，并通过这种生活方式构建其身份认同感。旅游不再被认为是“玩物丧志”的奢靡行为，而是成为文人士大夫所共同追寻的一种生活情趣与价值观的体现。

近年来已有不少关于明清时期文人士大夫旅游活动的研究出现。巫仁恕从消费文化的角度着手考察明代士大夫如何塑造出关于旅游的“品味”。³张嘉昕以寻泉、探洞、观瀑、赏花等为例，从不同面向完整呈现明代文人士大夫旅游生活的形态与意境。⁴陈宝良通过梳理明代士大夫的旅游观念，认为文人与道学家在旅游观念上具有很大差异，并将明代旅游活动归为贵人之游、豪士之游、布衣之游与民众之游四类。⁵而关于近代以来知识群体旅游生活的研究则为数不多。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沈松桥通过对 1930 年代知识分子大量西北旅行书写的文本分析，探讨近代中国国族疆域的想象过程。⁶基于此，本文拟以 1927 至 1937 年间的上海知识群体为例，考察民国时期城市知识群体旅游生活的主要特点及背后体现出的文化意涵。

¹ 本文系笔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生活场域与阶层再生产——以民国时期北京、上海知识群体为例（1927-1937）”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 13YJC840015。

² 龚鹏程《游的精神文化史论》，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76 页。

³ 参见巫仁恕《品味奢华——晚明消费社会与士大夫》，中华书局 2008 年版。

⁴ 参见张嘉昕《明人的旅游生活》，（明史研究丛刊），台北乐学书局 2004 年版。

⁵ 陈宝良《从旅游观念看明代文人士大夫的闲暇生活》，《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 年 3 月。

⁶ 沈松桥《江山如此多娇——1930 年代的西北旅行书写与国族想像》，《台大历史学报》第 37 期，2006 年 6 月。

一、街头漫步——一种日常休闲活动

19世纪前夜的上海道路生态以水路为主，陆路交通并不发达。开埠前夕，县城内方浜、肇嘉浜、中心河、薛家浜、侯家浜等河道纵横，街巷却仅有五十余家。¹这些为数不多的街巷依随地形自然形成，路面是天然泥土，晴时沙尘飞扬，雨天泥泞不堪。因此，开埠前上海县城内的陆路系统仍属于传统市镇的街巷布局，不具备近代城市道路系统的性质和功能。²开埠以后，西方殖民者在租界开辟道路，修建新式建筑，从县城北郊向西扩展的一片区域正在迅速形成一座现代化的新城市。在晚清上海，路已悄悄取代街、弄的传统地位，成为市区通道的首选形式。其东西向有龙华大街、徐家汇大路、法华大街、静安寺大街、洋泾浜大街、南京路、新闻大路等，南北向有大马路、虹口大街、新北门大街、三茅阁直街、老闸大路等。

3

租界与县城在城市交通方面的差别日益明显。“租界马路四通，城内道途狭隘；租界异常清洁，车不扬尘，居之者几以为乐土，城内虽有清道局，然城河之水，秽气触鼻，僻静之区，坑厕接踵，较之租界，几有天壤之别”。⁴一个外国人认为，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上海租界里的接到和租界外的道路，保养得能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相媲美。⁵姚公鹤也特别提及堪为代表的南京路，“公共租界中马路之最讲究者，以苏州河向南之四川路及南京路为最，以全路均用铁梨木平铺也。而养路之设备，则尤以南京路为最全。”⁶

每条街道都有人们的直觉在发挥着作用，然而，城市却是流动、选择、消遣、展示和买卖的综合。和城市的其他宁静和谐的区域截然不同，街道成为城市最主要、最混乱的部分。⁷十七至十八世纪的伦敦城区经过翻新改造，不同年龄、阶层的人们都乐意涌上街头，在大街上度过他们整天的时光。⁸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公共租界“中区和西区的房屋及办公大楼增多之后，两区马路上的行人及车辆相应大大增多，···在这一瓶颈似的通道，每天要通过大量各式各样的车辆——汽车、卡车、电车、马车、人力车、独轮推车、手推车以及成千上万的行人”。⁹因此，上海的公共交通问题日益凸显，城市街道变得拥挤不堪。一个笔名为易人的作者描述上海街头的热闹场景：

浙江路，先施公司前面的大马路，四通八达的十字路，横着像蜘蛛似的电车路轨，东南西北、来来往往的人群车马，没有一刻儿不是在人与人、车与车相挤着，那儿可说

¹ 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9页。

² 陈珺《上海城市生态的近代转型——以晚清上海道路为中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7月。

³ 罗苏文《路、里、楼——近代上海商业空间的拓展》，《史林》1997年第2期。

⁴ 李维清《上海乡土志》，第4—5页。转引自熊月之《上海租界的双重影响》，载自唐振常、沈恒春主编《上海史研究》第二编，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第42页。

⁵ 熊月之《上海租界的双重影响》，载自唐振常、沈恒春主编《上海史研究》第二编，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第43页。

⁶ 姚公鹤《上海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6页。

⁷ 【英】豪杰尔·科茨《街道的形象》，载罗岗、顾铮编《视觉文化读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1页。

⁸ Clare Brant & Susan E. Whyman. *Walking the Streets of Eighteenth-Century London: John Gay's Trivia (1716)*.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introduction, p2-p3.

⁹ 徐学筠等编译《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9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中国近代经济史料丛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282页。

是一个川流不息的交通总枢纽呀！¹

叶中强指出,随着清末民初大马路的兴起取代了四马路成为上海城市空间的中心商业区,“去逛大马路”成为新抵沪者的一种“入城仪式”,这条马路亦成为中外、城乡文化心态的最初接触、碰撞点。²然而,清末民初的文人知识分子之所以在大马路流连忘返,并非对大马路的街道本身有特殊喜好,而是热衷于百货公司、电影院、游乐场等街道两侧的各种新式消费空间。并且这种以“猎奇”为目的的街头闲逛仍处于日常生活中的“非日常”行为,并未内化至重复性与规律性的日常生活行为本身。至二三十年代,一些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在日常生活中有散步的习惯。马路在营构城市空间的同时,亦为人们提供了走向各类公共场所的通道。³沈从文在中国公学任教期间,“在上海玩,只是在无人走过的寂寞马路旁走走而已”。⁴郁达夫更是如此。在郁达夫的日常生活中,时常会有街头漫步的内容。根据叶中强制作的郁达夫 1926 年至 1927 年间在上海的生活日程表可以发现,郁达夫颇喜在街上闲逛。兹将该表中郁达夫的散步活动部分摘取出来,抄录如下:

郁达夫在沪期间散步活动表(1926年12月27日—1927年2月16日)⁵

日期	时间	活动地点	事略
1927年1月2日	午后	四马路、温泉浴室	路遇徐志摩夫妇,理发,逛街,沐浴
1927年1月4日	午后	北四川路、伊文思书铺等	访友,闲步,买书,饮酒、醉后访友
1927年1月14日	傍晚至夜	出版部、无名野路	饮酒,散步
1927年1月20日	傍晚至夜	书铺、北四川路、大马路酒馆、尚贤里、大世界	购旧书、散步、喝咖啡,饮酒、再访王映霞、听戏
1927年1月22日	傍晚至夜	出版部、街上	阅信,在街上漫游
1927年2月7日	午后	北四川路、宝山路百星大戏院	陪“许多穷朋友”逛街,看电影

郁达夫在此时期尚处于追求王映霞的阶段。因此,街头散步成为时常处于纠结、焦虑情绪中的郁达夫缓解情绪的一种方式。然而醉翁之意不在酒。即便在散步的时候,他想的也是王映霞。上表中 1 月 14 日的散步,“南风大,天气却温和,月明风暖,我真想煞了霞君”。

¹ 易人《夜市街头——漫谈浙江路》,《上海生活》1937年第5期,载吴健熙、田一平编《上海生活(1937-1941)》(老上海期刊经典),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51页。

² 叶中强《民国上海的城市空间与文人转型》,《史林》2009年第6期。

³ 叶中强《上海社会与文人生活(1843-1945)》,(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38页。

⁴ 沈从文《致王际真(1931年2月27日)》,载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8卷(书信),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34页。

⁵ 此表据叶中强“郁达夫在上海的一张生活日程表”摘录制作,参见叶中强《上海社会与文人生活(1843-1945)》,(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389-397页。

¹无法得到所思之人之芳心，让郁达夫在散步之时也感到沮丧。“灰暗”的街道颜色或许更多是郁达夫此时心情的投射。1月20日，“在灰暗的街上摸走了一回。终是走投无路”。²1月22日，郁达夫吃过晚饭后更是处于想登门拜访王映霞而又怕遭拒绝故而犹豫不决的纠缠状态，“只想出去，再上她那里去一趟。但想想前几回所受的冷遇，双脚又是踌躇不能前进。在暮色沉沉的街上走了半天，终究还是走回家来”。³3月1日的午后到尚贤坊找王映霞，“痴坐了一两个钟头，看看映霞终究没有出来和我同玩的希望了，就决意出来，走到马路上来，……又在霞飞路上跑了一圈，暗暗的天色，就向晚了”。⁴3月10日的午后，郁达夫同王映霞上郊外散步，“阳光虽则和暖，但天上浮云很多，坐公共汽车到了徐家汇，走上南洋大学去转了一个圈”。⁵次日，由于被王映霞看到了笔无遮拦的日记，郁达夫更是难受至极，“一个人在风雨交迫的大路上走着，我真想痛哭起来”。⁶

当郁达夫追到心上人后，散步成为俩人日常生活中常有的休闲活动。长时间室内生活使人感到憋闷烦躁，在天气适宜的时候外出散步不但给俩人带来安逸和舒适之感，对他们的夜间睡眠也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因为病的太郁闷了，所以一早起来，就上龙华去散了一回步。”

⁷王映霞也回忆起二人散步的情形：

每当轻寒薄暖的季节，我和郁达夫时常出去闲步。⁸在屋子里坐得气闷时，也就踱步到附近的几条人行道上闲步，谈着过去，谈到未来，再谈及这尚未出生的小生命。在这十里洋场的一角，是很少能够有人体会得出我们当时的满足的。⁹愚园路尽头，便是兆丰公园（今名中山公园）。我们从车上下来，进了公园，一直缓步到公园后门（曹家渡）出来。逛马路成了我们寂寞生活中的一种课程。郁达夫喜欢溜达，老是反背着双手，低着头，不作一声地向前走去。我们常在霞飞路（今名淮海中路）的洋槐或洋梧桐下的人行道上散步，向西走去，行不多时，徐汇天主教堂的双尖顶就可以望得见了，倘若我们的脚力还可以胜任的话，那么就会折向龙华。来回一次之后，我们并不感觉到怎样疲劳，可是这一晚的睡眠，必然很甜很香。¹⁰

婚姻生活难免摩擦与争吵。情绪化的郁达夫与王映霞发生不愉快的家庭战争后，俩人时

¹ 郁达夫《村居日记》，1927年1月14日，载郁达夫《郁达夫文集》第九卷（日记、书信），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第47页。

² 郁达夫《村居日记》，1927年1月20日，载郁达夫《郁达夫文集》第九卷（日记、书信），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第51页。

³ 郁达夫《村居日记》，1927年1月22日，载郁达夫《郁达夫文集》第九卷（日记、书信），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第54页。

⁴ 郁达夫《日记九种·新生日记》，1927年3月1日，载胡从经编《郁达夫日记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4页。

⁵ 郁达夫《日记九种·新生日记》，1927年3月10日，载胡从经编《郁达夫日记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1页。

⁶ 郁达夫《日记九种·新生日记》，1927年3月11日，载胡从经编《郁达夫日记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3页。

⁷ 郁达夫《日记九种·五月日记》，1927年5月2日，载胡从经编《郁达夫日记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2页。

⁸ 王映霞《掌勺、喝酒、散步》，载自王映霞《王映霞自传》，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72—73页。

⁹ 王映霞《我们的小家庭》，载自王映霞《王映霞自传》，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68页。

¹⁰ 王映霞《掌勺、喝酒、散步》，载自王映霞《王映霞自传》，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73页。

常走上街头一言不发，沿着俩人时常一起散步的街道漫无目的地踱步：

两个人距离二三十步，有时十几步，更有时好像并行着。不过彼此老是默不做声，活像两个陌生的行路者。有时向西行，从住处走到曹家渡，有时又走到霞飞路尽头，大家自管自地走着。这几条熟路，都是我们结婚前后携手同行过的地方。而曾几何时，心情便各有不同。一种伤感怀旧的情绪涌上心头。时间已经到深夜，他自己也走得有些疲倦了；两个无言无语地回到家中。这样地走了一场冤枉路，在他总算是已经发泄了闷气，我却在受折磨。¹

1927年的上海，沪宁一带风云突变，政局不稳。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随即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清洗。然而，时局的动荡不安对于一心沉醉于自己私人生活世界的郁达夫来说似乎毫无影响。刚刚收获芳心的郁达夫内心充满对未来的憧憬，法租界街道两旁的绿树红墙在他看来都格外亲切：

天气很好，傍晚一个人驱车过辣斐德路，看那路旁两排的中产人家，实在可以使人爱慕。残阳碎铺在红色砖瓦上，庭前的泊辣丹奴斯，朴泊辣树叶，都嫩绿了。微风吹来，还带着一点乐音，足证明这是文化的都市，而南京浦口的战事，丝毫不能混到我的脑筋里来。

2

本雅明在 20 世纪初发现了大城市的魅力，即一方面是熙熙攘攘、生活平淡而快乐、彼此陌生的人群，另一方面是悄悄发生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的“政治密谋”和“犯罪”。³相较于固定与密闭的建筑空间单元，街道是敞开与流动的，是一个脱离了日常政治逻辑与权力关系的自由飞地。因此，对于城市的管理者而言，街道是一个充斥着暧昧、模糊与危险的公共空间。长时间逗留街头的人是不受欢迎的。法国大革命以来，一个广泛的控制网络将资产阶级的生活更牢固地纳入网中。大城市的住房编号记载了标准化的进步。⁴在王笛看来，20 世纪初中国的城市管理者通过对街头活动的限制来扮演社会改良者的角色，将自身权力触角延伸至城市社会的最基层。⁵对于从事秘密政治活动的左翼知识分子而言，他们似乎深谙“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的道理。他们用各种方式在街道同巡捕房的密探们展开灵活的博弈。张戈不仅对年轻的蔡若虹说，“在马路上谈天比坐在屋里谈天保险”，还告诫蔡若虹“在马路上走路，两只眼睛要特别机灵，一旦发现‘钉子’（指租借巡捕房雇佣的密探，笔者注），就躲开他的视线”。⁶也有左翼知识分子选择冷僻的路线。马子华回忆，参加左联后，“开会也是三五人走在一起，顺着铁道线边走边谈，做出傍晚在郊外散步的样子。为什么要

¹ 王映霞《裂痕的出现》，载自王映霞《王映霞自传》，黄山书社 2008 年版，第 97 页。

² 郁达夫《日记九种·病闲日记》，1927 年 4 月 23 日，载胡从经编《郁达夫日记集》，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24 页。

³ 程巍《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 年代与文化领导权》，（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三联书店 2006 年版，第 101 页。

⁴ 【德】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等译，三联书店 1989 年版，第 66 页。

⁵ 参见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五章“控制”。

⁶ 蔡若虹《上海亭子间的时代风习》，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4-40 页。

走铁路线呢？因为来往的人极少，而且一眼看穿，不容易受人盯梢”。¹

热恋之中的青年知识分子情侣也喜欢在街头漫步。他们的散步时时透露出恋人之间的亲昵与趣味。萧红萧军初到上海时在法租界的拉都路居住。在那里，他们有过许多温暖的街头漫步的回忆：

吃过午饭之后，趁着冬天中午温暖的阳光，我们常常要沿着这条路向南散步。有时用去六枚铜元买得两包带糖咸味的花生米，每人一包，放在衣袋里，边走、边吃、边谈着。如果这天接到鲁迅先生的信，我们把信也带着，边走、边读、边谈、也边笑着。花生米总是我先吃完，她看我吃完了，反而故意一粒、一粒地慢慢吃，意思在“馋”我。有时表示“友好”也带着“怜悯”的表情举在手里送我一粒，我为了“自尊”常常是不肯接受的。但有时为了“盛情难却”也接受过来，送进嘴里去。²

时在中国公学上学的浦风喜欢到吴淞口的江边散步。一来得地利之便，二来呼吸新鲜空气：

颇久没到江边去散步了，今天特意约了二三友人到那边一行，真是另有一番滋味。月亮虽不十分清白，映在水里的银河般大的闪光，却也十分动人爱恋，何况更是浪潮之音，间杂其中呢！大约九点少一刻的时候方才返校，心中似乎仍有不足者，其趣味之浓可想而知了。³

行走从某个方面构成了城市，成为城市得以存在的一个基础。行人的脚步一方面拓展了城市空间，另一方面也使得城市对于行人具有了特殊的意义——由于行人的不同、行走时间不同、行走路线的不同，行人赋予城市的意义也就不同。⁴一些脱胎于晚清时期旧派文人的知识分子也在散步的过程中感受租界的异国情调。曾朴当时十分以能居住在上海法租界的马斯南路为乐，他自陈尽管此地房价高涨，他仍不愿搬家，就是因为非常享受在夕阳下散布在浓密树荫大街上的乐趣。⁵在法国公园散步，他便想像自己是在卢森堡公园，在霞飞路行走，便幻想自己走在香榭大道上，上海法租界街道上的宁静文化气息，使他想像自己身在巴黎。⁶街头传来的音乐声音也会令知识分子驻足停步，进而追念起往昔的生活场景。穆时英在霞飞路上散步时，被一家音乐商店里播放的歌曲吸引，勾起了他内心的回忆：

昨天，从霞飞路一家音乐铺前面走过时，我忽然又听见了黑舞姬约瑟芬·倍蕊的婉约的声音在唱着这支差不多已经忘下的，但又很熟悉的调子。它是深深地埋藏在我的记忆

¹ 马子华《意气方遒》，载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左联回忆录”编辑组编《左联回忆录》（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13页。

² 萧军《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一）》，《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第267页。

³ 李文儒编《浦风日记》，1931年8月17日，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5页。

⁴ 练玉春《城市实践：俯瞰还是行走》，载自孙逊、杨剑龙主编《都市空间与文化想象》，“都市文化研究”第5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80页。

⁵ 陈硕文《上海三十年代都会文艺中的巴黎情调（1927-1937）》，国立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第87页。

⁶ 曾朴《异国情调》（序言），上海世界书局1929年版，第10页。转引自陈硕文《上海三十年代都会文艺中的巴黎情调（1927-1937）》，国立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第87页。

里边，而且和我对于珍妮的怀念联结着。在站到十字街头和生活搏战着的今天，忽然又听到了这旧曲子，不由不忆念着烟似的旧事而怅惘起来。¹

有些知识分子不大愿意在自己家中招待朋友客人。街道，成为这些知识分子与朋友们日常交往的一个替代空间。在街头漫步中，知识分子与友人们谈天说地，分享交流各自的信息，加深彼此的交往。沙汀就是如此：

沙汀似乎不大愿意人常到他的家中去，很少有朋友被他招待在他的屋子里坐上二十分钟的，好像自己的屋子里藏着几许秘密似的。他说房间是休息与工作的地方，除了睡眠与写作外，就不能有其它。他说如果招待朋友闲谈或者讨论一些什么问题，那尽管到咖啡馆去，没有钱上咖啡馆，那末马路上也是很好的招待朋友的地方。因此每一个朋友到他家中去，刚踏进房门，还没有坐下来，便被他嚷住了。“呵！xx，我们好久不见了，去去去，我们到马路上走走去！”于是，他立刻穿上了外衣，领你到马路上去散步，一走便是好几个钟头，从来没有表现过一点不耐烦或者敷衍的态度，这种热情与精神却是没有第二人及得上的。²

一些年长的，特别是在政府部门等地有任职的知识分子喜欢在散步过程中和人攀谈，借此机会体察世相民情。叶恭绰三十年代在上海居住期间，“每星期中，总有一二个早上徒步出门，在大街小巷中同人家谈天，或是靠在沿街商店的柜子旁边和店员谈这谈那，或是在弄堂住家门口坐着和大娘们讲些家常。他的衣着很朴素，能说会道，还能和对方说些共同的语言，故到处受人欢迎。旁人当他们是老邻居、老相识，实在彼此都不相识，这样才可得知人们内心的爱憎。真所谓，秀才能出门，才知天下事。”³

二、日常出游——都市生活中的闲情雅致

都会性格的心理基础包含在强烈刺激的紧张之中，这种紧张产生于内部和外部刺激快速而持续的变化。对都市现象的反应使器官变得麻木不仁，毫无个性。⁴这种弥漫在都市人群中的漠然之感也形成了生活在都市之中的人对身边的事情丧失兴趣的无聊、厌世之感。二三十年代身居上海的知识分子感受到都市日常生活在精神上带来的疲倦之感。他们到上海城区范围之内的特定地方游玩，给都市生活增添一份闲情雅致。这些地方大体有：荒郊野外、园林及沪上八景等地方。

相比于城隍庙、沪上八景之类人头攒动、车水马龙的市内旅游休闲之地，吴淞、真茹、松江等荒郊野外之地以其人烟稀少和空旷开阔吸引了中下阶层的青年知识分子前去踏足。

“游必须名川大山，然而在现在这样的世界，身非名公大人，未必有配游得资格。庐山自然

¹ 穆时英《两个恋》，上海《小晨报》1935年9月22日，载自严加炎主编《穆时英全集》第3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57页。

² 吴福辉《沙汀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74-175页。

³ 陈光辉《叶恭绰和上海的文化事业》，载自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科教文卫）》第1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第394页。

⁴ 【英】西美尔《大都会与精神生活》，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编《城市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2-133页。

不敢去，杭州？连车钱也不够。但我终于被载在一辆华商的公共汽车上，向真茹送走了”。

¹曹聚仁回忆起印象最深的丽娃栗姐村，“入门就得坐一小舟渡过来，自成一天地。绿草如茵，高木参天，那是消暑圣地。草地北一小舞池，池边有音乐台，那是露天舞池。情侣双双，款款切切，别有世界非人间了。”²谙熟十里洋场生活的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喜欢和女友在丽娃栗姐河划船，在田野散步，和朋友在乡间打猎，感受大自然的勃勃生气与趣味：

三年前，那时也是春天，我和玲姑娘慢慢地散着步，在这郊外的沥青路上。田野里有麦的香味，有布谷鸟的双重的声音，有松脂的焦香，有平静的天空，平静的阳光。我们会坐到草地上，坐到石埠上，坐到落花上，坐到树根上，我们会靠着桥栏站下来，我也会轻轻地吹着口笛，笑着。³

对于广阔的田野，对于望不到尽头的，悠长的郊外路，我是以一种罗曼蒂克的心情爱好着的。漫步着，望着和地平线溶合了的天空，和峙立在榛树丛中的，奶黄色的小别墅，给繁重的工作麻痹了的，时常被禁闭在狭窄的书室里边的幻想与感情便会鸽子样飞翔起来。于是想着些辽远的地方的花圃，向别的城市驶去的列车，愉快地，在灵魂里边笑着。⁴

志戴这几天，天天到我们这里来，来了就到乡间去漫步。他打野狗的本事真不错！在这一礼拜中，他至少打了十七头野狗。⁵

吴淞位于今上海市区北部，黄浦江与长江汇流处，东距长江口 30 余公里，北与崇明岛、东与长兴等岛隔水对峙，扼长江主航道翼侧，为上海、南京的通海门户。一个署名东篱的知识分子“精神硬是振作不起来”，“几天来看了好多篇报纸副刊上登载着关于游春一类的应时文章”，遂认为“该趁这良辰美季找个机会脱离这吵闹的都市，到野外去寻求，享受一点自然方面的赐兴”。于是他去了吴淞，原因是“远处地方不但化费大，时间方面也不允许，去吴淞，一天功夫正够用，化费很小，而且这里又是我曾经住过三四年的旧地，玩起来一定另有一番情趣”。以“烟雨”空气为特色的吴淞让作者感到与往日迥然不同，并且有种十足的新鲜感。“感受到空气的不同，闷人的都市气息，滚你的去罢。我尽量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跳着，笑着，叫着，我们好像到了一个新的世界。”⁶

明、清时期，吴淞是重要的海防与江防要塞。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驻守吴淞炮台的将士浴血奋战，打退日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⁷在中国公学旧址游览时，作者也唏嘘感慨，

¹ 魏猛克《纪游》，《申报·自由谈》1933年5月12日。

² 曹聚仁《“丽娃栗姐村”之忆》，载曹聚仁《上海春秋》，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83页。

³ 穆时英《燕子》，《申报·自由谈》1933年3月11日，载自严加炎编《穆时英全集》第3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4-15页。

⁴ 穆时英《新秋散记》，上海《小晨报》1935年9月12日，载自严加炎编《穆时英全集》第3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45页。

⁵ 穆时英《施蛰存函（二）》，1935年6月28日，载自严加炎编《穆时英全集》第3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39页。

⁶ 东篱《吴淞行》，《创作月刊》第1卷第2期，民国珍稀短刊断刊相关资料（上海卷），第1812页。

⁷ 顾增龄《吴淞炮台忆旧》，载上海市宝山区地方志办公室、上海市宝山区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吴淞开埠百年》，1998年版，第30页。

“那些深埋在地下长眠的枯骨，他们那些为国捐躯的男儿们，要到哪里才能找回来呢？”。

1

清代以来，上海就逐渐形成了一些被文人士大夫所称颂的特定景致。“昔人就沪地之堪作题咏者编为八景，曰海天旭日、曰黄埔秋涛、曰龙华晚钟、曰吴淞烟雨、曰石梁夜月、曰野渡蒹葭、曰凤楼远眺、曰江皋霁雪。”²尽管二三十年代上海已经俨然是一个现代都市，但这些上海的传统自然景观仍然是知识分子日常生活中休闲出行的好去处。时为沪上八景之一的龙华寺，以其古刹和晚钟著称。“浮图七级高插云表，颇称壮丽，昔人多有题咏”。“每逢三月十五日，焚香赛愿者遐迩毕集”。³龙华从明代起就是上海人游览的地方。⁴“上海无公园，鲜名胜，十里洋场甚嚣尘上，居者倦焉，每欲换空气，稍弛脑困，苦无其他，而春光大好，龙华寺中香客云集，日以千计”。⁵一个笔名为程小青的作者“觅一清凉区域，而有名胜古迹趣味者，则舍此龙华一塔，聊资点缀而外，殊不可得矣。”遂与同事“于新元君，倡议作龙华游，谢生芳芹闻之，欣然徒行，并愿以汽车迎送”，“偷闲作半日之清游焉。”⁶

观，即目之游，因此观也有游的意思。“观”首先是要看一个大的空间，所谓“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兰亭集序》）。“俯仰”成为一种精神状态。目既往复游驰，心亦徘徊驰骤，游目即是游心。⁷知识分子在这些风景之地俯仰观游，借景色之迤迤婀娜以求逸出日常劳作之外之幽游。在龙华寺塔上，作者凭栏远眺，在物我两忘之心境中发思古之幽情，获得内心恬静之感：

是日风和日丽，垂荫拂堤，轻絮扑面，景色澄鲜，胸襟为爽，塔凡七层，初不甚高，第凭栏俯眺，浦江迤迤，波光帆影，历历在目，而寺屋重重，依次排列，犹若婴孩之玩具，亦足以扩眼界。既下塔复绕镇闲行，镇有横街一，才数百武，街绝狭，两旁市尘，殆百年前物。予每历此种境地，辄不禁思古之念，联想曩日社会，恬淡无扰，书长人静，听□者报君知，一声两声，风送入耳，自有一种幽趣。今则潮流所趋，由静而动，回忆旧状，直类梦中事矣。⁸

中国士大夫阶层，向有治园娱己奉亲之传统，亦有假园聚友举会之习惯。⁹受到西人设立“公园”的刺激和示范，晚清以来，许多私家园林相继开放，对文人之交游提供了方便。徐

1 东篱《吴淞行》，《创作月刊》第1卷第2期，民国珍稀短刊断刊相关资料（上海卷），第1816页。

2 陈伯熙《淞沪风景谈》，载陈伯熙编著《上海轶事大观》（民国史料笔记丛刊），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页。

3 陈伯熙《龙华沧桑谈》，载陈伯熙编著《上海轶事大观》（民国史料笔记丛刊），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页。

4 杨嘉祐《龙华寺和龙华塔》，载吴贵芳编《上海风物志》，上海文化出版社1982年版，第99页。

5 陈伯熙《龙华道上之今昔》，载陈伯熙编著《上海轶事大观》（民国史料笔记丛刊），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页。

6 程小青《龙华塔登眺记》，《申报》（自由谈）1927年5月9日第4版。

7 龚鹏程《游的精神文化史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14-217页。

8 程小青《龙华塔登眺记》，《申报》（自由谈）1927年5月9日第4版。

9 叶中强《上海社会与文人生活（1843-1945）》，（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272页。

园原名双清别墅，清光绪丙午年徐鸿逵筑园于闸北，宣统元年，其子迁筑于今地。¹徐园是民国时期沪上著名的私立园林之一，其清幽雅致的格调与园内的花草树木吸引了许多知识分子闲暇时来此消度时光。由于地处偏远，“游人不无有幽栖地僻经过少之慨，故每岁除兰花、菊花、梅花盛开时，仅于日间开会娱宾外，新正灯夜之游竟尔不可复得”。²一个笔名为成言的知识分子记述了他与友人在兰花开放时节游玩徐园的情形：

高人雅士，绝足于尘嚣之场，求清闲幽静之处而不可得。有之，其惟康脑脱路徐园乎。徐园地虽僻西，公共汽车直达于门。交通颇称便利。花草树木，曲径通幽，亭台楼阁，雅洁宜人。复有池沼湖亭之胜，峰峦土山之美。际此春光明媚之际，更有鹃兰名花之会，记者久欲一畅胸襟而未遇其机。会得舅氏之招，因欣然往焉。

入门。江君紫来俟于户，导游各胜景。游人二三往来，雅趣盎然，有出世之想。鸿印轩鹃花盛开，色间红白，陈列各得其所，王者香则陈内厅，花分种种，品茗看花，好风送香，沁人心肺。胸中积郁，一旦尽吐，亦快事也。小坐闲谈，复遂观园中佳景，不觉红日西下，离而他去，恋恋不止。³

半淞园是沪上另一个著名园林。半淞园在沪南车站之前，濒临黄浦，初为天主教友沈某住宅花园，建筑悉从西式，风景颇可观。后沈某辟其迤北隙地，增造一中国古式花园，另开门户，始有今名。⁴曹聚仁“到上海之初，市民郊游，端阳游船，重九登高，都到高市高昌庙的半淞园去。”⁵1927年的《申报》“自由谈”上有一篇关于半淞园的游记：

春光老去，我辈无送春之文，亦当又饯春之游，沪上半淞园，尘嚣中之清凉地也，春光烂漫中，游兴久动，适合凉生来沪。旅邸无聊，乃与游斯园。复约红蕉赆夔为伴。先时至红蕉□饭后，至法国公园小憩，旋驱车往半淞园，龙华道上，游人如炽。入园，清翠之气，扑人眉宇，在湖心亭，凭栏而坐，清风徐来，俗虑全消。湖中游鱼往来，争相竞食。客有投以杂物者，群来争噬。含凉生方吸卷烟，以残烟投湖中，鱼亦吞食。忆余自来沪以后，欲游半淞园屡矣，乃以人事牵绊，未尝夙愿。今于暮春时节，一游胜地，兼亦残春之意也。旧朋旧侣，欢然道故，春光将老，偕游名园，共作残春之举，亦单调生活中得一调剂也。⁶

从上述这些日常出游的记述可以看出，这些游记的作者多带有传统旧文人游山玩水的生活习性。他们的出游时间通常选择在春天，且少有独自出游，多是呼朋引伴。游玩地点也多选择上海市内的园林、古迹之处。这些清雅之地被知识分子视为有别于十里洋场的尘嚣之地。知识分在这里或小坐，静观花草虫鱼之趣，或登高远眺，以观耳目所及之大，身心在这样的

¹ 中国旅行社编《上海导游目次》，国光印书局 1934 年版，第 157 页。

² 陈伯熙《双清别墅（二）》，载陈伯熙编著《上海轶事大观》（民国史料笔记丛刊），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33 页。

³ 成言《徐园鹃兰一瞥记》，《申报》（自由谈）1927 年 5 月 4 日第 4 版。

⁴ 陈伯熙《半淞园》，载陈伯熙编著《上海轶事大观》（民国史料笔记丛刊），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33-134 页。

⁵ 曹聚仁《半淞园登高》，载曹聚仁《上海春秋》，三联书店 2007 年版，第 280 页。

⁶ □陶《名园残春记》，《申报》（自由谈）1927 年 5 月 3 日第 4 版。

游玩中脱离了日常生活的奔波劳作，得到了放松和休养。

一些年轻的左翼知识分子们出游则是缘于“地下工作”之需要。大量下层工人密集居住与工作的棚户区、工厂区成为他们重要的出游地点。然而，即便是身负政治任务，这些生活在都市，以伏案工作为主的年轻人也不时体会到户外的乐趣。1933年5月，楼适夷、应修人等人“因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了一次春天的远足。一位朋友带我们去参观杨树浦的一家纱厂”。参观完毕，大家“雇了一条舢板从黄浦江回来。我们一群六七个人，其中有黎烈文、沈起予、丁玲、冯雪峰，把一只小舢板挤得密密的，大家贪婪地欢笑着，呼吸到好久没有接触的江上清新的大气。”¹

由于出游时日多选在风和日丽之节假日，故对于出行路上人头攒动之拥挤，路人表情之舒展之类的细节，知识分子也深有体会：

五一前一日，友辈邀我游江湾，参观赛会，以午后之头班车往。车中乘客，倍徒平时。袖云汗雨，蔚成奇臭。其挤塞之情形，方之避难时期之两路客车，殆相伯仲。顾时期不同，情态各别，曩之簇其额，攒其眉，今则眉展而气扬，嬉嬉然，洋洋然。²

女性从家庭走向社会，亦体现于街道。早在清末，即有人慨叹，“上海地方妇女之蹀躞街头者不知凡几，途间或遇相识之人，欢然道故，寒暄笑语，视为固然。……此风日甚一日，莫能禁止”。³民国时期，尽管女性出入园林、庙会等公共空间日益普遍，但仍然成为知识分子笔下关注的对象。许多知识分子在日常出游过程中对接踵而过的女性过目不忘。在三篇关于城隍庙、江湾赛会及半淞园的游记中，都无一例外的记载了游玩途中见到的女性：

因为这一天是阴历的十五，庙里到处走动着一一些浓妆艳抹的女人，林告诉我这些都是上海三四等的妓女；这，可以算是这次逛城隍庙给我的印象最深的三种人物了。⁴

游客中多女性，□妆炫饰，奇服冶容。游客之眼波，不期而交集。恶少年且评头论足，恣其月旦以为快。街之东，有一女郎，年十五六以来，鹤立木台上，台四周，游人靡集，目有观，视台上，口有言，女郎朴素而淡雅，风吹秀发，日映霞姿，为状益妩媚，益娟柔，翩然仙气，回视粉黛中人，粪土耳其，是知美人之美，在天然，奚事实气珠光，工为修琢哉。虽然，春色满园，一枝红杏，过墙蜂蝶，我为女郎危，而盼其能善自蕴璞也。⁵

湖心亭对岸之长堤上，有妙龄女郎策驴行者，女郎年在十七八，穿浅色长服，胸佩一大蝴蝶结，截发革履，作时世装。数少年亦策驴相征逐。⁶

19世纪晚期以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伴随而来的社会矛盾的加剧，女性逐渐

¹ 楼适夷《记湖畔诗人应修人》，载自《文人笔下的文人》，岳麓书社出版，第351页。

² 张芷痕《江湾赛会之碎锦零缣》，《申报》（自由谈）1927年5月4日第4版。

³ 《二人摸乳被枷》，《申报》1872年6月4日。

⁴ 虬若《城隍庙巡礼》，《十日谈》第26期，《民国珍稀短刊断刊》（上海卷）第14382—14385页。

⁵ 张芷痕《江湾赛会之碎锦零缣》，《申报》（自由谈）1927年5月4日第4版。

⁶ □陶《名园残春记》，《申报》（自由谈）1927年5月3日第4版。

成了传统男性焦虑与恐惧的主要对象。¹民国时期引领上海女性服饰风尚的多为妓女。从上述文字中可以看出，知识分子一方面为这些女性“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容貌倾倒，另一方面又站在道学家立场上有感于轻佻世风、浮华奢靡的都市氛围而对这些女性持担忧立场。这种内在的紧张也是上海都市文化的一个体现。

三、越界旅行——逸出日常边界的体验

“每个旅行者都有一个故事。”这句西方谚语不仅表明游记写作在西方文化中的普遍性，而且也预示着游记在西方叙述体文学中的核心地位。游人远行，就代表了出离具体生存之此世的行动，到达另一个不是自己具体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游客”的身份，便具有在而不在的性质。新世界、新社会在他眼前展布，人即仿如获得新生。²因此，旅游者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区隔。在生活上区隔出“一般现实性生活”和“逸游以欣赏生命的行动”两部分，前者无论如何迁徙奔走，都仍应视为居者，因为它仍然困居于尘世之中。只有逸豫以欣赏生命的行动，才是出游，游出了一般日常性现实生活之外。其次，其游观游览游赏，也不以世俗社会为对象，而是以尚未社会化的自然景观、较原始的人文状态为目标。³透过文化采风、民俗观光、名胜古迹或佳山秀水的造访等，以满足一时的耳目之娱，暂忘身心的疲顿，最后达至性灵生活的充实。⁴

无论是日常出游还是越界旅行，通常选择风和日丽的季节。许多知识分子认为春天是旅行的最佳时期。“春天的快乐。终不离开我们的脑中。个个都有意思出去旅行。旅行的日期。多半选择在清明或春假。”⁵“今年的废历清明，我们往常熟观仰观仰姑丈的新屋，乘便游了一回闻名已久底虞山。”⁶在郁达夫看来，“春天的好处，在于人的不大想吃饭；春天的坏处，在于人的不大想做事。……总之春天不是读书天，春服既成，春情初动，踏青扫墓，还愿进香，倒似乎是春天的惟一的正经。”⁷

传统文人士大夫对花木有深厚的感情。在他们的潜意识深处，从来不把花木当作外在的自然物看待，而总是把它们当成与自己一样的有生命的活物看待。⁸文人士大夫往往把自己的价值取向，赋予花木身上。《礼记》中说，“其在人也，如松柏之有心也，故贯四时不改柯易叶”。作为生命有机体的松树，它有萌生之日，必然也有老死之时，然而，古人却认为它常青不老，甚至认为它身上的松实、松脂也具有强筋健骨、延年益寿的效果。⁹一个笔名为

¹ 孙绍谊《想象的城市——文学、电影和视觉上海（1927-1937）》，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2页。

² 龚鹏程《游的精神文化史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75页。

³ 龚鹏程《游的精神文化史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99页。

⁴ 张嘉昕《明人的旅游生活》，《明史研究丛刊》，台北乐学书局2004年版，第146-147页。

⁵ 白沙琵琶《不要刨黄瓜儿》，《玲珑》第1卷第3期，第87页。

⁶ 盛震《虞山游》，《红玫瑰》第5卷第32期，1929年出版。

⁷ 郁达夫《说春游》，《申报·自由谈》1933年4月18日。

⁸ 李珣平《花木：从自然中汲取情趣》，载黄卓越、党圣元编《中国人的闲情逸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8-169页。

⁹ 李珣平《花木：从自然中汲取情趣》，载黄卓越、党圣元编《中国人的闲情逸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朱垣君的人趁元旦假期，与友人前往距离松江之西的一个名为石湖荡的镇上慕名观赏一棵古松：

镇东约半里，有楞严庵者。相传谓为邻村头冈谢氏家庵。建于宋初，年必修葺。得以至今存在。庵凡三间二进，中有庭。庭中古松一株。筑庵时所植也。宽可八抱，高约十丈。离地二丈余。始生枝叶。茂盛异常。顶专圆如伞盖，终岁苍翠。远望之，俨然一小峰。其叶稍黄即脱下。此松曾载华亭志。称为江南第一。名人墨客之前往赏鉴者，数百年来，不知凡几。庭之四壁，时有题咏。余闻私名久矣。徒以十年来负笈春申，无暇前往一观。初四日，与至友杜贾二君，放舟赴石湖塘，得一见之。令人肃然起敬。观壁上诗句之高超隽逸，尤为之神志一清焉。¹

位于苏州的虎丘是江南地区著名的旅游景点。“至苏州不游虎丘，为欠事”。²春秋时期，吴王阖闾葬于此地。六朝时期，虎丘由帝王陵寝开始成为佛教名山和游览胜地。宋代以后，虎丘以佛教圣地和游览胜地著称。杨应诏《游虎丘记》也认为“东南号佳山水，控三江五湖之胜莫最于姑苏，姑苏左淮海右洞庭，灵俨崿屹秀口莫最于虎丘。……中多小溪曲涧狭其间如抱月然，入其境不百步许，泉之冽石之清，林木之断口不可状”。³张海平“因第十六期航空公路奖券不中，又愤乎国事之蝸蟾，乃应语堂先生之约，作姑苏之行，以消来沪三月胸中所积洋楼臭气。”⁴尽管此行似为应约而行，但作者缘于喜爱《浮生六记》中的三白夫妇，因此爱屋及乌，对苏州这一“盛产才子之区”抱有浓厚的兴趣：

我亦颇爱三白，于是以寻求三白夫妇之遗迹为此行之副业。饭店不知是谁的别墅，虽改为旅馆，犹有园林味。其中有池塘、有垂柳、有菊、有盘松，壁上且又扇面画屏，扇面中有一张仕女图，画一女子，斜抱梧桐，全身重要部分均压在树干上，其下一足微翘，眼神痴痴也，有不胜其情之慨，这些，在别处却不易得见。大致苏人确能风雅，连一饭店，亦不肯示弱，随意摆设，便能使人着迷。以此能产生三白等人，不声不响，即可留下杰作几部。我闻才子之名甚久，今天幸而到了盛产才子之区，别的不管，我倒要留心看看这才子区地环境究竟如何。⁵

受到福柯话语与权力观念影响的后学家认为地图是意志的产物，而非对地理事物的“客观”展现。在他们看来，地图是一种文本、一种话语形式。话语的讲述者，是社会权力，当社会中出现两种对立的权力时，地图也成为它们争战时各自“讲述”出来的不同“语言”，造成不同的地方意义（place meaning）。⁶为了避免先入为主的从众观点，凸显自身独特的见

2007年版，第174页。

¹ 朱垣君《江南第一松》，《申报》（自由谈）1927年3月2日第4版。

² 黄厚诚《虎丘新志》，北平友联中西印字馆1935年版，第5页。

³ （明）杨应诏《天游山人集》，第15卷，第6页，转引自张嘉昕《明人的旅游生活》，台北乐学书局2004年版，第146页。

⁴ 张海平（发表时署名海戈）《与林语堂游苏记》，《逸经》第11期，1936年8月5日出版。

⁵ 张海平（发表时署名海戈）《与林语堂游苏记》，《逸经》第11期，1936年8月5日出版。

⁶ 唐晓峰《地图中的权力、意志与秩序》，商务印书馆编《中国学术》，2000年第1期。

解与品味，知识分子在旅游过程中有意回避各种旅游指南等手册中记载的地理信息，而倡导亲临其境的私人体验。张海平的游记鲜明地体现出这一点：

虎丘在苏州阊门外，离城几里？位于何方？那是徐霞客或苏州指南编者的事，与我无干。我只说我们坐上黄包车，从饭店出发，一路尽是奇怪曲折高低不平的羊肠小径，也不知哪里来这么多的河，房舍街道都在河边。桥亦不少，好像到虎丘寺前，还经过一道。¹

户外旅行也是一次难得的体验风土人情之旅。一些知识分子在旅行途中对目力所及之当地世相、民风都有详细记录，并时时与自己的居住地作比较。一个笔名为吟阁的知识分子在去宁波旅行途中，对宁波的工厂十分留意：“宁波多小工厂，办理均甚得法。……宁波工厂多‘娇小玲珑’，能搏节开销，活用资本，厂主与工人亦甚和洽，此其所以成功者多，失败者少也。故余尝言办小工业于外国当取法日本，于本国当取法宁波。”²一个笔名为崇瑶的知识分子从上海到广州旅游。途中，作者对广州当地工人组织的井井有条、广州当地轮渡价格的透明以及广州街头乞丐的稀少印象深刻，并时时与上海相比较：

第一个印象映入我们眼帘的，便是广东人组织能力的表现，大规模的工会中的各项井井有条，各部分工作，如印刷厂，夜校，剧社，娱乐等等，在在使得我们满意。其次便是有秩序的精神，这是由各方面见到的，比如坐船渡海，上车下车等，这种秩序很好，行时绝不拥挤，也不像上海的争先拥后，以我们坐船而论，如果在上海，你陌生人一定会吃亏而被敲竹杠的，但是在广州，讲定的价钱就是了，一点没有敲竹杠，最使你奇异同时也使你永不会忘记的，便是无论在什么地方找不出一个乞丐，绝对的找不到像上海这样多要钱的叫花子，这一点不能不推他们办理市政者良好的结果。³

十九世纪欧洲人的旅行，主要目的在于自我肯定和自我修养。旅行者整装待发，就是为了获得一种全新的空间体验和与正常环境之外的其他人进行交流的新感觉。⁴将游历感受用诗词歌赋的方式表达出来，是趋好雅致的文人知识分子同普通民众相区隔的方式之一。与赵景深、阿英等人同游扬州后，田汉赋诗一首以留纪念：

江潮如吼打孤城，白世犹闻杀敌声。今日倾危如昔日，梅花岭上访先生。春堤十里柳千条，如此风光入素描。平视侧观都艳绝，瘦西湖上五亭桥。非关明月动吟怀，访缺寻残破铁鞋。碧血犹腥文献邈，阿英惆怅校场街。两三渔火一桅舟，待渡瓜州古渡头，南国故人应记取，当年风雪上扬州。⁵

文人知识分子倾向于将旅游中的观感与已有历史典故的记载相比照，借此丰富自己的文

¹ 张海平（发表时署名海戈）《与林语堂游苏记》，《逸经》第11期，1936年8月5日出版。

² 吟阁《浙游漫纪（下）》，《生活周刊》第3卷第33期。

³ 崇瑶《游广州（上）》，《生活周刊》，第308页。

⁴ 【法】菲利普·阿里艾斯主编《私人生活史》第4卷“演员与舞台”，北方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439页。

⁵ 田汉《镇扬日记（1937年）》，上海《青年界》第12卷第1期，1937年6月版，载自《田汉文集》第20卷，第278-279页。

化涵养。胡适在外出旅游的途中十分注意与已有典籍中关于旅游之地的描述相对照。他在旅途中不仅时时为自然风光与文化风景所赞叹，对于当地居民生活状况、谋生手段等细节也十分留意，甚至查考一番。1928年4月至7月间，他与高梦旦等结伴同游白鹿洞与寒山寺等地，并在日记中有详细记载：

船近江阴时，忽见江北岸上桃花盛开，然此地桃花之盛从来不见于文人的记述，我们今日的发现全处于偶然。¹大概此地交通不大便，故游人甚少；科举废后，江阴久不成文士奔走之地，故桃花也就被埋没了。²梦旦带有吴炜的《庐山志》，共十五卷，我借来翻看。³将起程时，见轿夫玩江西纸牌，引起我的注意，故买了一副来查考，果有历史价值。此牌与福建牌，徽州牌，同出于马吊，源流分明。⁴昨夜大雨，终夜听见松涛声与雨声，初不能分别，听久了才分得出有雨时的松涛与雨止时的松涛，声势皆很够震动人心，使我终夜睡眠甚少。⁵

然而，也有知识分子反对这种作法，认为这是毫无创意与灵性的行为。在邵洵美看来，“离家几百千里，从一个山头再走到另一个山头，回来便把一处处的名胜，参考了前人的游记、当地的志书，加些描摹又加些赞叹的词句，写上几千字一篇文章，这种勇气或傻态几乎有些不尽人情”。⁶然而，邵洵美的出门旅行，却无关风景与猎奇探险，而是继续看书写作：“一进客栈，我便几乎早晚躲在房里”，“往常旅行总有许多随身法宝：第一件要紧的当然是书，至少要十几本；还有稿纸，笔，和墨水”。⁷

生活优渥的知识分子要将他们精致的日常生活方式延续到旅行之中，这使 they 要携带大量生活用品在身边。邵洵美出门旅行时不仅要带手头翻阅的书籍、写作的稿纸，还有其他许多物品：“香烟非三五罐不够，我那种烟仔外埠不容易买到；拖鞋一双，因为我有个习惯，一坐定便想把鞋子袜子完全脱光；还有消化药，头痛药，牙痛药，也是非带不可的，我以前每次都用过他们”。⁸相较于日常忙碌紧张的生活，旅行也能够让旅行者的身心放松，成为日常生活的调剂。许广平回忆鲁迅，“在旅途上，他的生活比平常较闲些。大约这时他不执笔写字，暂时可以休息，所以路上食量较在家好，而且也不晕船”。⁹

1930年代，中国面临外敌交侵的深重危机，开发西北、巩固边防的呼声应运而生。许多

1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第5册，1928年4月5日，第27页。

2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第5册，1928年4月5日，第27-28页。

3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第5册，1928年4月7日，第30页。

4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第5册，1928年4月8日，第30页。

5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第5册，1928年4月9日，第36-37页。

6 邵洵美《出门七件事》，《时代》1935年第8卷第8期，“时代讲话”专栏，邵洵美《儒林新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59页。

7 邵洵美《出门七件事》，《时代》1935年第8卷第8期，“时代讲话”专栏，邵洵美《儒林新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59-60页。

8 邵洵美《出门七件事》，《时代》1935年第8卷第8期，“时代讲话”专栏，邵洵美《儒林新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60页。

9 许广平《鲁迅的生活之一》，《职业生活》1939年10月25日，转引自许广平《许广平文集》第2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63页。

来自内地大都会的知识分子，在“救亡图存”的国族主义意识形态激励下，深入西北地区考察游历。¹这种时局引发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其它地方的旅行中也随处可见。赵家璧在天津旅行时，对天津的租界感到不快：“……天津的租界真是多，不到三步路，洋车夫就告诉我说这是英法交界了，一拐弯又是日意交界了。小小的一块地，就分割成了八国的租界。……我们住惯上海租界的人，时常觉得自己并没有住在租界里，到天津来看到街头那种各不相同的巡捕的制服，心头才会涌上些说不出的味儿。”²旅行者的异域体验并非只有陌生与新奇的兴奋，也有孤独与漂泊的苍凉。倪贻德的游记《秦淮暮雨》抒发了漂泊生活中寂寞、无聊的酸楚。作者将深秋的玄武湖写成一位孤苦伶仃的老人，“他既没有妇人，当然也没有儿孙，每天伴着他的，只有几本破书和几张旧画。他从来没有踏出外边去看一个人，人家也从来没有一个人进来看他。每到了西风飒飒的晚秋，或夕阳向晚的黄昏时分，他总是默默地靠在窗口，看了窗外一片单调的景色，听了远处吹来几声孤雁的哀号……。”³

余论

民国时期的城市知识群体在日常生活中有许多出游的活动。这些活动一方面继承了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游历之好，另一方面也因受到都市生活的影响而具有新的特征。本文以 1927 至 1937 年间的上海知识群体为例，对此问题加以考察。研究发现，上海知识群体的出游活动在地域空间层面，大体有作为日常休闲活动的街头漫步、以上海市内各园林、古迹、景点为主要场所的日常出游以及逸出日常生活边界的越界旅行三种。清末民初的文人知识分子之所以在大马路流连忘返，并非对大马路的街道本身有特殊喜好，而是热衷于百货公司、电影院、游乐场等街道两侧的各种新式消费空间。并且这种以“猎奇”为目的的街头闲逛仍处于日常生活中的“非日常”行为，并未内化至重复性与规律性的日常生活行为本身。至二三十年代，都市生活特性已经内化至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本身，一些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有每天散步的习惯。左翼知识分子在街头从事各种秘密活动。一些脱胎于晚清时期旧派文人的知识分子在散步的过程中感受租界的异国情调。街道也成为一些知识分子进行日常交往，构建社会关系网络的一个公共空间。

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知识群体感受到都市日常生活精神上带来的疲倦之感。他们到上海城区范围内的特定地方游玩，给都市生活增添一份闲情雅致。这些地方大体有：荒郊野外、园林及沪上八景等地方。这些清雅之地被知识分子视为有别于十里洋场的尘嚣之地。知识分子在这里或小坐，静观花草虫鱼之趣，或登高远眺，以观耳目所及之大，身心在这样的游玩中脱离了日常生活的奔波劳作，得到了放松和休养。

¹ 沈松桥《江山如此多娇——1930年代的西北旅行书写与国族想像》，《台大历史学报》第37期，2006年6月。

² 赵家璧《北行印象》，《良友》1935年8月号，第108期。

³ 倪贻德《秦淮暮雨》，载自巴平主编《中国散文鉴赏文库》（现代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702页。

知识群体在旅行生活中发展出多样的私人体验。一些人将其视作一次难得的体验风土人情之机会，在旅行途中对目力所及之当地世相、民风都有详细记录，并时时与自己的居住地作比较。也有知识分子与传统文人游历习惯相似，将旅游中的观感与已有历史典故的记载相比照，丰富自己的学识涵养。为了避免先入为主的从众观点，凸显自身独特的见解与品味，一些知识分子在旅游过程中有意回避各种旅游指南等手册中记载的地理信息，倡导亲临其境的私人体验。旅行者的异域体验并非只有世外桃源般的陌生与新奇之兴奋。在时局影响下，他们所感受到的既有民族主义情绪之愤慨，也有孤独与漂泊的苍凉。

[原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十六卷（下）》，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88—105页。]